

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以文化政策為主^{*}

內田直文^{**}

王毓雯^{***}

摘 要

本論文旨在介紹近年日本蒙元時代史以蒙元朝統治中國與文化政策為主之研究。近年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中，視蒙古帝國時代具有劃時代意義，藉由總合歐亞全體，重構當時歷史全貌之研究為其主流。本論文主要介紹以中國為據點、君臨蒙元帝國的元朝文化、政策、命令文書所見之地區統治、出版事業等具代表性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文化政策

^{*} 本論文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臺灣國立中正大學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世變與轉折：蒙元時期的文學、文化與藝術」宣讀。在此感謝研討會主辦中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蔡榮婷教授、汪詩珮教授、淡江大學教授呂正惠教授、成功大學許守泯教授等給予寶貴之意見，在此一併致上感謝之意。

^{**} 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兼任講師。

^{***} 日本福岡大學言語教育研究中心講師。

引言

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如下：一、將遼、金、元等異民族看做為統治中國(china proper)的非漢族王朝，視其為「征服王朝」。二、猶如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將元朝對中國的統治視為單純的中華王朝之交替，視其為「專制王朝」。然而，近年以蒙古帝國時代於世界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為一橫跨歐亞大陸擴展統治版圖的帝國，故應重新構築當時歷史整體樣貌之研究成為一大潮流。在此潮流下，將漢地定位為帝國統治的根基，利用多種語言史料、石刻史料來探究當時統治實相的研究亦累積不少成果。本論文將就以下二方面論述：首先介紹蒙元時代透過統治中國的相關文化政策、命令文書所進行的漢地統治、江南統治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相關研究；同時論述蒙元與清代的關聯性。

本論文將橫跨歐亞之元朝等四個國家，總稱為蒙古帝國。統治中國的王朝稱為「元朝」，1206年成立的蒙古帝國稱為「蒙元」。

有關日本戰前、戰後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已有不少論究成果，島田虔次等編著、山根幸夫編著、杉山正明、森田憲司等皆有詳細的論述。¹本論文根據先行研究內容加以彙整分析。又有關文化政策，已有元朝史專家櫻井美智專篇論文介紹1990至2000年初的研究動向，²故於此不再辭費。此並非筆者之專業，故在此僅能以筆者粗淺的學識，廣泛介紹日本蒙元時代文化政策相關研究成果。又筆者的專業主要是探究清朝中國多元的統治政治結構以及清代戲曲文化。筆者根據自身的專業與個人所關注的課題，於此將蒙元文化政策作一彙整，故倘有疏漏之處，亦待諸學者多方指教。

一、回顧：關於征服王朝論

日本「東洋史」研究，在明治時代以降引進歐洲近代歷史學的風潮下，與「西洋史」研究處於相互對置的地位。特別是滿蒙研究與滿鮮研究，當時視為日本對中國大陸政策之一環，甚受重視，研究內容極為繁富。其中，那珂通世、白鳥庫吉、箭瓦互、羽田亨、和

¹ 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第一卷—中國 I，（京都：同朋社出版，1985[1983 初版]）；山根幸夫編：《中國史研究入門》上，（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1983 年初版]）；杉山正明：〈日本におけるモンゴル（Mongol）時代史研究〉，《中國史學》第 1 卷（1991），頁 211-231；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輯委員會編著《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頁 497-528；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の興亡》上、下（東京：講談社，1996）；杉山正明：〈日本における遼金元時代史研究〉，《中國—社會と文化》第 12 號（1997），頁 329-342；森田憲司：〈金・元〉，礪波護等編《中國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² 櫻井智美：〈日本における最近の元代史研究—文化政策をめぐる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史學》第 12 卷，2002 年，頁 123-145。

田清等不少優秀學者輩出。戰後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可以說皆在這些前輩的研究基礎上得以發展。

其中特別是羽田亨氏的見解，長時期影響後來日本學者對蒙元時代中國統治、文化政策的理解。他指出，蒙元時代，蒙古人對中國文化不甚理解，以蒙古本位政策（亦即日本學者所謂「蒙古主義」、「蒙古至上主義」）的立場來推行文化政策。³然而，吉川幸次郎氏則由文學史的角度指出，隨著時代的推移，蒙元諸帝對漢人文化之浸潤與造詣逐漸提升，可窺見蒙元在吸收中國文化後之改變。⁴日本近年元朝史研究，猶如後述，如同宮紀子氏研究成果所顯現出來一般，各學者分別提出元朝廷積極進行中國文化保護政策之相關見解。吉川幸次郎氏的此番見解，可謂頗具先見。

從東亞研究所編著《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等遼、金、元、清時代統治中國的相關書物出版甚多看來，戰前蒙元時代史研究極為盛行。⁵

德裔美國學者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的遼代研究。⁶不僅對戰後日本，或是各國中國史學界皆予以極大影響。魏復古以遼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為基礎加以整體全面的考察，用「文化程度」的基準對中國歷代王朝加以分類。其分類如下：（1）秦漢、魏晉、隋唐、宋、明等典型的漢民族王朝社會，亦即「專制王朝」。（2）北魏、遼、金、元、清等非漢族的征服王朝社會，亦即「征服王朝」。眾所周知，魏復古氏的此一分類太過於單純，以致受到多方批評，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田村實造氏，⁷護雅夫之研究。⁸但是，魏復古氏重新以「涵化」的觀點來探討非漢族王朝與中國社會接觸時，或是吸收或是抵抗，時而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文化。此一「涵化」理論，至今在研析中華王朝上仍為有力的分析方法。

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 （1）視蒙元出自於遼、金系統，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 （2）視蒙元為統治中國的非漢族征服王朝。
 - （3）如同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單純以中華王朝的交替視點，視其為專制王朝。
- （1）此研究以本田信實為代表，⁹其運用波斯語，以中央歐亞為主軸，採以總合的角度

³ 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1928），收錄於《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

⁴ 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東洋史研究》，第8卷第3号（1943），頁27-39；第8卷第4号（1943），頁21-33；第8卷第5号（1943），頁73-85；第9卷第1号（1944），頁37-51；第9卷第2号（1944），頁49-58。

⁵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

⁶ Karl A.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⁷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上（1964）、中（1971）、下（1985）（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⁸ 護雅夫：〈總説〉，《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9—〈內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3-17。

⁹ 本田實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來分析橫跨東歐，西亞蒙古帝國的廣大版圖，試圖重新構築歷史的整體樣貌。(2)、(3)則以中國本土為主要考察對象，皆為探討蒙元時代於中國史上的定位問題。因對「文化涵化」的理解程度不同而產生相異的見解。他指出，從中國本土統治方面來看，(2)是屬於遼→金→蒙→元→明的系統，(3)是屬於宋→元→明的系統。若以一歷史世界來看中國本土全體，就必須將遼宋金元視為一體，才能具體掌握整個時代。¹⁰

田村實造氏從北亞歷史的觀點，將東亞全體視為一歷史世界。¹¹他認為征服王朝的特徵為遊牧、農耕的複合。遼以後的征服王朝，解構了北亞社會以氏族共同體為中心組織的部族制，試圖進行中央集權化。為此，征服王朝中的專制君主、官僚與被統治階層間存在著緊密的封建關係。征服王朝的時代，具有北亞與中國相互適應所產生的特性而孕育出不少嶄新文化。

宮崎市定氏建構了北亞諸部族與中國文明接觸融合後而誕生了新「中華王朝」的理論。田村氏的研究，受到了宮崎市定氏理論的影響。田村氏認為，從原有的遊牧部族的氏族共同體形態將王朝體系化甚為重要。此外，田村還指出征服王朝更為專制，建立了強固的中央集權體制，他藉此對魏復古氏所提出的「專制王朝」「征服王朝」的看法提出疑義。儘管如此，至今日本東洋史研究仍以此二分類作為區分王朝的標準。

近年來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多認為蒙元時代以歐亞大陸為主，結合了世界，具有劃時代意義。也因此近年來跳脫中國史的框架，以橫跨歐亞大陸的廣大蒙古帝國的宗主國來加以定位的相關研究逐年增加。有關於此，將於下節做一介紹。

二、發展：杉山正明的蒙元時代史研究

蒙古帝國於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以來，僅數十年便發展為橫跨東歐、西亞、中亞、東亞與中央歐亞巨大帝國。忽必烈即位後，統治中國本土的蒙元王朝，與其他三國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又以寬緩的帝國秩序相聯繫。

近年，杉山正明氏對歷來蒙古橫跨東洋、西洋，故大航海時代的15、16世紀各文明圈始見連動的歷來一般見解提出疑義。他認為，蒙古帝國時代，於歐亞各地產生連動，使得此一共通現象得以生發於各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蒙古時代在世界史上具有早於大航海時代的劃時代意義。因此他積極強調有必要構築蒙古帝國時代起的陸海歐亞史的全貌。¹²

¹⁰ 杉山正明：〈日本における遼金元時代史研究〉，同註1。

¹¹ 同註6。

¹²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東京：朝日出版社，1995）；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の興亡》上、下，同註1；杉山正明：〈日本における遼金元時代史研究〉，同註1；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杉山正明：〈日本における遼金元時代史研究〉，同註1。杉

蒙古時代史的研究深廣繁富，當然所涉及的資料語言包括了漢語、波斯語、二大史料群、蒙古語、維吾爾語、西藏語等多語言。此外，漢語文獻不只是文言，如《元典章》等法制史常出現的吏文，夾雜這個時代特有的口語語彙，故須具備足以翻譯蒙文直譯體風格的白話漢文讀解能力以及元代漢語音韻素養等多樣語言能力，這正如杉山氏研究的特色，運用語言能力，博覽研析東、西洋的各類資料。因此，杉山氏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如下的見解，此一時代的研究應對帝國統治的實像，以及為江南、東南沿海等地帶來經濟發展、並連結大元之整體經濟系統做深入的考察，縝密、有力地表現蒙古帝國時代。

杉山氏研究蒙古時代史的目的在於，藉由總合歐亞全體，重構當時歷史的全貌，其結果，中華王朝在當時整個蒙古帝國下僅屬於帝國東部地區。歷來在中國史的框架下以「征服王朝」或「專制王朝」的視點來分析元朝時，華北社會中，金至元以及江南社會的南宋、元、明的延續性等研究出現盲點，故以杉山氏所提出的見解來分析考察，產生了新的研究潮流。事實上，近年日本中國前近代史對於宋、元，北中國、南中國的延續性、非延續性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以宋、金——元——明此一長期的時間軸為中心而加以分析的研究有遞增的趨勢。

在此一蒙元時代研究的新潮流下，各國的研究機構、文獻館積極整理公開相關史料。相較於前，資料的使用的便利性亦獲得不少改善。為此，多樣的漢語文獻外，總合性地利用畏兀語、波斯語、西藏語等各種語言之文獻，重構蒙古時代政治史，掌握分析以遊牧國家、遊牧官制為基礎材料的研究增加不少。

元代中國各地建有甚多石碑，在理解地區民眾、社會的實際狀況上，為重要之資料。近年，在當地的援助下，石刻的調查更為廣泛、綿密，以此為研究資料的研究成果甚夥。

接著在下一節將以蒙元時代史研究的新潮流為基礎來探討元朝統治下的文化政策。

三、新潮流：從文化政策來看日本近年蒙元時代研究

歷來蒙元時代史研究指出蒙古人掌握實權，專司財務的官僚多任用西亞出身的色目人，蒙古人、色目人為蒙古帝國統治的主軸。其結果形成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嚴密的階級制度。在施行「蒙古本位政策」，漠視傳統中國文化非漢族的統治下，漢人文人階層的地位下降，而傳統中華文化不受重視。

然而，關於元朝統治下的社會階級制度，舩田善之氏重新加以探討，他認為非漢語史

山正明：《遊牧民族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1[1997年初版]）。杉山正明：《逆說ユーラシア史》（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2）。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と長いその後—興亡の世界史 09》（東京：講談社，2008）。

料中並未特別區分色目人，仁宗重新舉行科舉之際，並列記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對不甚了解漢文化者列爲色目人。¹³另外，櫻井智美氏指出，駐紮於慶元的軍戶葛邏祿人，因已不需從軍而開始學習儒家文化、培養詩文素養，以參加科舉考試。¹⁴上述的實證研究顯示，蒙古帝國沒有嚴密的階級制度，而歷來對蒙元漠視儒教等中國文化的理解本身則具有疑義。

日本的蒙元時代史研究出現了轉換期，對歷來以「宋明」「元清」漢族王朝、非漢族王朝的分類所見的時代觀、王朝觀出現了重新探討的趨勢。爲此，自王朝延續、非延續的一面，金——元一連串的歷史開展等視點來探討江南社會由南宋至元——明的連續性等問題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爲主流。

本節特別介紹以下幾點：（1）大都城相關研究（2）元朝其他地區社會的實際狀況——華北社會與江南社會（3）科舉、出版事業等相關的文化政策。（4）並簡單介紹近年就蒙元帝國出版事業多方的考察，對日本東洋史學界予以極大影響的宮紀子氏的《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一）大都城相關之研究

杉山氏對蒙古帝國元朝大都城在空間結構上所發揮的作用有不少論述。杉山氏認爲，大都透過大運河通往江南、藉此通往海域與東南亞、西亞結合。¹⁵另一方面，從上都越過蒙古高原，通過陸上交通與東亞、東歐相結合，元朝可汗定期巡幸大都、上都，使得此二處成爲海陸大動脈，於帝國內形成了廣大的都市圈。

近年來大都城與其近郊進行挖掘，不少遺跡、遺物出土。有學者以此爲基礎加以探討，如渡邊健哉探討了元朝至明朝初期，大都城的構造與都市空間的變遷。¹⁶此外，渡邊氏還探討了大都科舉相關的議題。

乙坂智子氏探討了大都的「遊皇城」，此祝祭肇源於佛教儀禮。¹⁷其雛形源於中國六朝

¹³ 船田善之：〈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108編第9號（1999），頁43-68；船田善之：〈元代の戶籍制度における色目人〉，《史觀》143（2000），頁33-48。

¹⁴ 櫻井智美：〈元代カルルクの仕官と科舉〉，《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3（2009），頁173-187。

¹⁵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と大都〉，《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485-518；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戰〉，同註12；杉山正明：〈大都と上都の間〉，礪波護編《中國歷代王朝の都市管理に関する總合的研究》，（京都：明文舎，1999），頁168-186。

¹⁶ 渡邊健哉：〈元代の大都南城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82（1999），頁103-121；渡邊健哉：〈大都研究の成果と課題〉，《中國—社會と文化》20（2005），頁520-528；渡邊健哉：〈元の大都における中央宮廳の建設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8（2010），頁49-71。

¹⁷ 乙坂智子：〈元大都の游皇城〉，今谷明編《王權と都市——「與民同樂」の都市祭典》（京都：思文閣，2008），頁170-208。

時期，南宋臨安亦舉行，而元代則受到遼、金時代在華北舉行的都市巡幸祭之影響。此都市巡幸祭的遊行行列由民族、宗教的角度來看，實顯現出「混一華夷」的實際情況，而遊行行列於皇城內的巡行路線，則表現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成一體。可以確認的是，自唐代後半期至宋代在國都皇帝與百姓形成一體的祝祭活動，亦於元朝大都舉行。

新宮學氏考察了明初朝廷決定由南京遷都至北京的決策過程以及北京紫禁城的空間結構，探究明朝為繼承統一北亞的元朝政權。¹⁸

如上所述，中華王朝在空間、時間統治上具象徵性的王宮形態，亦反映在元朝時期的大都城，而這亦由延續至明朝。

（二）元朝時代地區社會的實際狀況——華北社會與江南社會

如前所述，將元朝視為承繼金、南宋，其後由明代承繼的中華王朝為現今日本元朝史研究的一個主流。為此，應有華北社會由金至元的繼承性以及江南社會南宋、元、明的承繼關係的認識。在這一方面，大都以吏文與蒙古語直譯體漢文書等官撰書、文人文集、地方志為資料來加以分析。而活用華北社會石刻史料亦獲得嶄新的成果。此相關研究，可參考飯山知保氏的展望。¹⁹

首先，先介紹華北社會。在石刻史料所留存的蒙古語、漢語並記（蒙漢合璧）的命令文方面，有杉山正明氏從歷史、語言方面的詳細探討成果。²⁰村岡倫氏就現存於山西省高平縣聖姑廟的「阿識罕大王令旨碑」的資料，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考察。²¹此外，舩田善之氏就擔任傳達命令文書的開讀使臣巡禮路線詳加考察。²²以上的研究，縝密地探討了元朝可汗或分封各地諸王的命令文書以及傳至華北地區社會進而立碑的過程，使我們清楚了解到元朝統治華北社會的實際狀況及其影響。主要是以森田憲司氏、舩田善之氏、井黑忍氏、飯山知保氏等學者為中心的團體，持續對當地的立碑地、碑林等作縝密地調查，其研究成果豐富。²³如此綿密的調查作業，不僅對今後當地調查提供重要的資料，同時亦擴展了以石刻

¹⁸ 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

¹⁹ 飯山知保：〈金元華北社會研究の現状と展望〉，《史滴》23（2001），頁52-71。

²⁰ 杉山正明：〈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1）〉，《内陸アジア語の研究》20（1989），頁1-31；杉山正明：〈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2）〉，《内陸アジア語の研究》21（1990），頁35-55；杉山正明：〈八不沙大王的令旨碑より〉，《東洋史研究》第52卷第3號（1993），頁105-154。

²¹ 村岡倫：〈モンゴル時代の山西平陽地區と諸王の權益〉，《一三、一四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10（2009），頁1-15。

²² 舩田善之：〈元代命令文書の開讀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3卷第4號（2005），頁36-67；舩田善之：〈元代の命令文書の開讀使臣について—その人的構成と巡歴ルートを中心に—〉，《東方學》111號（2006），頁89-106。

²³ 森田憲司：〈曲阜地域の元代石刻群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學》19（2001），頁48-70；森田憲司：〈北京

為研究素材的蒙元研究之可能性。

有關滅金後統治華北的元朝初期，對漢人士人階層的政策方面的研究，可參考森田憲司氏的研究成果。²⁴

井黑忍氏，詳細考察區田法的政策決定過程，探討由金至元的一個政策的意義產生了何種變化。²⁵

植松正氏對元朝征服南宋後的江南社會，很早就提出江南「豪民」的存在並加以探討。²⁶豪民的研究在思考江南社會南宋、元、明的延續性時為一重要課題。另外，堤一昭氏考察江南征服後元朝的軍事體制、統治結構。²⁷中砂明德氏則論述了唐代至明代江南社會的定位問題。²⁸

（三）科舉出版事業等元朝文化政策

歷來研究指出元朝漠視中國文化，不重視中國士人。然而近年來，探討元朝儒教、科舉等多方層面，並重新探究的論考逐漸增加。這些論考的特徵在於從華北社會遼、金、元的延續性、以及南宋、元的延續性的視點來分析。

首先是對《新編例舉三場文選》《大科文選》等答案集的科舉資料加以分析的研究。²⁹

地區における元朝石刻の現状と文獻》，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總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經濟システムの基盤的研究》（平成12-1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2002），頁1-25；舩田善之、井黑忍、飯山知保：〈陝西、山西訪碑行報告〉（附：〈陝西、山西訪碑行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史滴》24（2002），頁151-184；舩田善之、井黑忍、飯山知保：〈滎陽、沁縣、交城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2（2004），頁19-22。舩田善之、井黑忍、飯山知保、小林隆道：〈北鎮訪碑行報告〉（附：〈北鎮訪碑行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史滴》28，2006年，頁1-15；舩田善之：〈「靈巖寺執照碑」碑洋所刻文書を通してみた元代文書行政の以一斷面〉，《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0號（2005），頁81-105；舩田善之：〈山東日照・諸城の元代石刻の現状—石刻現地調査の展望と課題—〉，九州大學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人文科學）《東アジアと日本—交流と變容》4（2007）頁11-20。

²⁴ 森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

²⁵ 井黑忍：〈區田法實施に見る金・モンゴル時代農業政策の一斷面〉《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4號（2009），頁1-35。

²⁶ 植松正：〈元朝支配下の江南地域社會〉，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輯委員會編著《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頁333-358；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²⁷ 堤一昭：〈元朝江南行臺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54卷第4號（1996），頁71-102；堤一昭：〈大元ウルスの江南駐屯軍〉，《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19號（1998），頁173-198；堤一昭：〈大元ウルス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4號（2000），頁173-198；堤一昭：〈大元ウルス江南統治首腦の二家系〉，《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22號（2000），頁193-218。

²⁸ 中砂明德：〈江南史の水脈〉，《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1（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177-200；中砂明德：《江南—中國文雅の源流》（東京：講談社，2002）。

²⁹ 森田憲司：〈元朝の科舉資料について—錢大昕の編著を中心に—〉，《東方學報（京都）》73（2001），頁157-184；櫻井智美：〈元代科舉受験持込許可書をめぐって—『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註』を中心に—〉，

元朝學校亦即廟學發揮管理知識階層的功用，牧野修二以《廟學典禮》的內容來探究廟學。³⁰此外，元朝時代盛行的家塾方面，有片山共夫氏等論考。³¹片山氏認為，元朝家塾興盛的原因在於宋金元科舉、朱子學的需求提高、士人階層增加，元朝以學校官、吏員管理士人，因實行了學問與政治分離的文化政策，而增加了家塾，亦即以學問為謀生的方法。

近藤一成氏分析探討宋末至元初期浙江湖州、慶元的進士的及格人數，以及士人與社會的關聯性。³²此外，櫻井智美氏，如前所述，分析探討駐紮慶元的色目人學習儒教，提高詩文創作能力等，詳細分析當時科舉應試的實際情況。飯山知保氏考察華北地區金元時代科舉的應試人數以及當時學習儒學的駐紮軍家系和漢人軍戶的實際狀況。此外，還論述儒教文化亦深入影響非漢族統治下的華北社會。³³另外，有關從制度等多面相分析元代科舉現狀的研究，請參考。³⁴

（四）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在這之中，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一書，³⁵以元朝出版物、出版事業、以及儒教政策等多角度來分析元朝文化政策。宮紀子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中國文學專業，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一書，獲得東方學會賞、日本中國學會賞。她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歷來對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文化政策的看法。接著，將就此書做一簡單介紹。首先，第 I 部「蒙古時代的「漢語」資料與繪本的登場」中，以口語漢語語彙完成的出版書物和插畫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蒙古朝廷文化政策以及各機關系統、科舉制度、文人動向等問題，以深入了解蒙元統治下的中國實際狀況。

第一章除指出維吾爾族出身的貫雲石《孝經》的註釋書《孝經直解》文體，類似於《元

《中國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頁 1-22。

³⁰ 牧野修二：〈元代の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史研究》第 37 卷第 4 號（1979），頁 54-76；牧野修二：〈元代廟學書院的規模について〉《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 12 號（1979），頁 29-55；牧野修二：〈元代生員の學校生活〉，《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 13 號（1980），頁 1-23。

³¹ 片山共夫：〈元代の家塾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29 號（2001），頁 29-65；片山共夫：〈元代の家塾について（續）〉，《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30 號（2002），頁 86-125。

³² 近藤一成：〈宋末元初湖州吳會の士人社會〉，《古代東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福井重雅先生論古稀・退職記念論集〉（2007）；近藤一成：〈黃震墓誌と王應麟墓道の語ること—宋元交替期の慶元士人社會〉，《史滴》30 號（2008），頁 141-163。

³³ 飯山知保：〈女真・モンゴル支配下華北の科舉受験者數について〉，《史觀》157（2008），頁 40-57；飯山知保：〈金元華北における外來民族の儒學習得とその契機〉《中國—社會と文化》22（2008），頁 27-43。

³⁴ 渡邊健哉：〈近年の元代科舉研究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96（2006），頁 83-93。

³⁵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典章》中之蒙古語直譯體，並論述了此書為武宗誕辰時敕命出版的經過。此外，還闡明了武宗時期比仁宗時期更積極熱衷於振興儒教文化的實際狀況。

第二章分析考察鄭鎮孫著《直說通略》一書，本書以白話文體記載三皇五帝至宋、金的主要歷史，藉此來探討蒙古朝廷對出版的保護政策。

第三章論述蒙元王朝中任高官要職者參與《三國志》一書的成立過程，而劉備、張飛、諸葛亮等人的加封、追封亦與成書有密切的關係。

第四章以《老乞大》為研究資料。《老乞大》描述高麗商人於大元大都經商的過程，在朝鮮為語言學習教科書。此以蒙古語直譯體紀錄的文書，不僅在中國，亦廣泛使用於其他地區。現存最早的《舊本老乞大》發現於1998年，其語法和蒙古語直譯體極為相似，該書是以由蒙古語寫成的《老乞大》為前提而成立的。並指出蒙古時代的文書行政影響至明朝、朝鮮。直譯體外交文書除了在中國，亦用於和朝鮮、新疆、西藏、汶萊等各地他語言地區交涉時，其理由在於當時廣泛使用蒙古語直譯體。

第Ⅱ部「蒙元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從出版的視點，來探討蒙古時代的儒學振興政策。

第五章以「加封孔子制誥」碑文為研究對象，此為武宗下旨敕令將孔子的稱號加上「大成」二字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所刻碑文，透過考察聖旨敕令的過程，將成宗至英宗時代同時連同武宗文化政策加以探討，以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六章考察紀錄元朝學校制度的《廟學典禮》，本書使用了甚多類書的插圖以及儒教關聯的出版物。而此書的編纂並非以現行的儒學關聯公牘為主，主要以畫來表現禮制。

第七章以程復心的四書註釋書《四書章圖》為考察資料，詳細論述國家出版的具體過程、江南士人保舉的過程。本書首次出示了蒙古時代的國家出版制度，以及人物出仕的相關著作，具體探討其過程中儒學提舉司與肅政廉訪司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第八章藉由出版、科舉，來分析士人的實際狀況。探討大元王朝時代的科舉問題，以「對策」科目為主，縝密地考察其實施內容以及參試者的書籍、學習法。

第Ⅲ部「由地圖所見之蒙古時代」第九章以新發現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研究資料，論述地圖成立的經過、狀況，並探討日本各地流傳的問題。之後，宮紀子氏將其加以整理，出版《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³⁶

宮紀子氏將所搜羅的龐大繁複之資料加以分析，提出嶄新的見解，其論述受到讀者的矚目。然而，當中亦有對蒙元文化評價過高之傾向。其結果，如論述明朝的文學作品多剽竊自蒙元時代等問題，此亦仍有待商榷之處。又第四章主要探究《老乞大》，宮紀子氏論述此書是以蒙古語直譯體記載，然而近年，舩田善之氏，根據歷來的論說探討《老乞大》一

³⁶ 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7）。

書的文字，應為「漢兒語言」，其論說具有說服力，³⁷據此，宮紀子氏所提出的見解，亦有需要慎重考察之處。

以上就日本近年蒙元時代史研究，主要以文化政策做一介紹，本論文之內容為筆者以個人所關注的課題所加以彙整，疏漏之處，亦待學者多方指教，期望此一彙整能成為了解日本研究動向的一個契機。

結語

清朝是由狩獵社會的東北通古斯族女真人建立的中華王朝。日本的清朝史研究將清朝與元朝一同置於征服王朝、專制王朝的框架下加以考察。然而，清朝統治的不只是中國本土、還包括了滿洲、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形成了一個巨大帝國。近來，深受蒙古時代史研究的影響，將清朝理解為承續蒙古帝國的研究趨勢較強。

歷來，清朝研究史研究以地方志、文集、以及檔案等官撰資料為主流。文化政策如推行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大規模編纂事業，另一方面，如大力推行《四庫全書》的編纂事業，事實上其目的在於審閱歷代圖書，箝制士人批判政權，這其中存在著所謂的「華夷」觀。清朝的文化政策使得士人言論遭受箝制，士人投身於實證的考證學，而帶來了考證學的興盛。從這點來看，對照現日本對元朝文化政策毫不批評地予以評價的研究趨勢，值得我們應該更加深入探討。

³⁷ 船田善之：〈モンゴル語直譯體の漢語への影響〉，《歴史學研究》875號（2011），頁1-12、頁64。

引用書目

一、 近人論著

乙坂智子：〈元大都の游皇城〉，今谷明編：《王權と都市—「與民同樂」の都市祭典》，京都：思文閣，2008年，頁170-208。

山根幸夫編：《中國史研究入門》上，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1983年初版）。

中砂明德：〈江南史の水脈〉，《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頁177-200。

———：《江南—中國文雅の源流》，東京：講談社，2002年。

井黒忍：〈區田法實施に見る金・モンゴル時代農業政策の一斷面〉，《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4號，2009年，頁1-35。

片山共夫：〈元代の家塾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9號，2001年，頁29-65。

———：〈元代の家塾について（續）〉，《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0號，2002年，頁86-125。

本田實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

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上（1964）、中（1971）、下（1985），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1〉，《東洋史研究》，第8卷第3号，1943年，頁27-39，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5，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元の諸帝の文學2〉，《東洋史研究》，第8卷第4号，1943年，頁21-33，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5，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元の諸帝の文學3〉，《東洋史研究》，第8卷第5号，1943年，頁73-85，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5，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元の諸帝の文學4〉，《東洋史研究》，第9卷第1号，1944年，頁37-51，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5，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元の諸帝の文學5〉，《東洋史研究》，第9卷第2号，1944年，頁49-58，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卷15，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羽田亨：〈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1928年，收錄於《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

-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と大都〉，《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頁485-518。
- ：〈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輯委員會編著：《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頁497-528。
- ：〈八不沙大王の令旨碑より〉，《東洋史研究》第52卷第3號，1993年，頁105-154。
- ：〈大都と上都の間〉，礪波護編：《中國歷代王朝の都市管理に関する總合的研究》，京都：明文舎，1999年，頁168-186。
- ：〈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1）〉，《內陸アジア語の研究》20，1989年，頁1-31。
- ：〈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2）〉，《內陸アジア語の研究》21，1990年，頁35-55。
- ：〈日本におけるモンゴル（Mongol）時代史研究〉，《中國史學》第1卷，1991年，頁211-231。
- ：〈日本における遼金元時代史研究〉，《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2號，1997年，頁329-342。
- ：《クビライの挑戰》，東京：朝日出版社，1995年。
- ：《モンゴル帝國の興亡》上、下，東京：講談社，1996年。
- ：《遊牧民族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1年（1997年初版）。
- ：《逆說ユーラシア史》，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2年。
- ：《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年。
- ：《モンゴル帝國と長いその後—興亡の世界史09》，東京：講談社，2008年。
- 村岡倫：〈モンゴル時代の山西平陽地區と諸王の權益〉，《一三、一四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10，2009年，頁1-15。
- 和田清編：《支那地方自治發達史》，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1939年。
- 和田清編：《支那官制發達史》，中央大學出版部，1942年。
-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說》，東京：東亞研究所，1943年。
- 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總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經濟システムの基盤的研究》，平成12-1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

2002 年，頁 1-25

牧野修二：〈元代の儒學教育—教育課程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史研究》第 37 卷第 4 號，1979 年，頁 54-76。

———：〈元代生員の學校生活〉，《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 13 號，1980 年，頁 1-23。

———：〈元代廟學書院の規模について〉，《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 12 號，1979 年，頁 29-55。

近藤一成：〈宋末元初湖州吳會の士人社會〉，《古代東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福井重雅先生論古稀・退職記念論集》，2007 年。

———：〈黃震墓誌と王應麟墓道の語ること—宋元交替期の慶元士人社會〉，《史滴》30 號，2008 年，頁 141-163。

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國が生んだ世界圖》，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7 年。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年。

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第一卷—中國 I，京都：同朋社出版，1985 年（1983 初版）。

船田善之、井黒忍、飯山知保、小林隆道：〈北鎮訪碑行報告〉（附：〈北鎮訪碑行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史滴》28，2006 年，頁 1-15。

船田善之、井黒忍、飯山知保：〈山西、河南訪碑行報告〉，《大谷大學史學論究》11，2005 年，頁 117-156。

———：〈陝西、山西訪碑行報告〉（附：〈陝西、山西訪碑行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史滴》24，2002 年，頁 151-184。

———：〈滎陽、沁縣、交城現存確認金元碑目錄〉，《13、14 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2，2004 年，頁 19-22。

船田善之：〈「靈巖寺執照碑」碑洋所刻文書を通してみた元代文書行政の以—斷面〉，《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0 號，2005 年，頁 81-105。

———：〈モンゴル語直譯體の漢語への影響〉，《歴史學研究》875 號，2011 年，頁 1-12、頁 64。

———：〈山東日照・諸城の元代石刻の現状——石刻現地調査の展望と課題—〉，九州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人文科學）《東アジアと日本—交流と變容》4，2007 年，頁 11-20。

- ：〈元代の戸籍制度における色目人〉，《史觀》143，2000年，頁33-48。
- ：〈元代の命令文書の開讀使臣について—その人的構成と巡歴ルートを中心に—〉，《東方學》111號，2006年，頁89-106。
- ：〈元代命令文書の開讀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3卷第4號，2005年，頁36-67。
- ：〈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108編第9號，1999年，頁43-68。
- 堤一昭：〈大元ウルスの江南駐屯軍〉，《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19號，1998年，頁173-198。
- ：〈大元ウルス江南統治首腦の二家系〉，《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22號，2000年，頁193-218。
- ：〈大元ウルス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4號，2000年，頁173-198。
- ：〈元朝江南行臺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54卷第4號，1996年，頁71-102。
- 森田憲司：〈元朝の科擧資料について—錢大昕の編著を中心に—〉，《東方學報（京都）》73，2001年，頁157-184。
- ：〈北京地區における元朝石刻の現状と文獻〉，松田孝一編《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國、元朝の政治・經濟システムの基盤的研究》，平成12-1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2002年，頁1-25。
- ：〈曲阜地域の元代石刻群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學》19，2001年，頁48-70。
- ：〈金・元〉，礪波護等編《中國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
- ：《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
- 植松正：〈元朝支配下の江南地域社會〉，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輯委員會編著：《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頁333-358。
- ：《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
- 渡辺健哉：〈大都研究の成果と課題〉，《中國—社會と文化》20，2005年，頁520-528。
- ：〈元の大都における中央宮廳の建設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38，2010年，頁49-71。
- ：〈元代の大都南城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82，1999年，頁103-121。

———：〈近年の元代科擧研究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96，2006 年，頁 83-93。

飯山知保：〈女真・モンゴル支配下華北の科擧受験者數について〉，《史觀》157，2008 年，頁 40-57。

———：〈金元華北における外來民族の儒學習得とその契機〉，《中國——社會と文化》22，2008 年，頁 27-43。

———：〈金元華北社會研究の現状と展望〉，《史滴》23，2001 年，頁 52-71。

新宮学：《北京遷都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 年。

櫻井智美：〈元代カルルクの仕官と科擧〉，《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3，2009 年，頁 173-187。

———：〈元代科擧受験持込許可書をめぐって——『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註』を中心に——〉《中國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 年，頁 1-22。

———：〈日本における最近の元代史研究——文化政策をめぐる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史學》第 12 卷，2002 年，頁 123-145。

護雅夫：〈總說〉，《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9 ——〈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頁 3-17。

Karl A.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into the Mongol and Yuan Period: Focusing on Cultural Policies

Naofumi Uchida^{*}

Yu-wen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period with a focus on the Yuan dynasty's rule of China and its cultural policies. 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has tended to paint a picture of a pan-Eurasian empire, treat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Mongol Empire as an epoch-making occurrence in world history. This paper examines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into region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cultural policies and imperial edicts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ruled an area centered in China at the peak of the Mongol Empire, as well as its publishing efforts.

Keywords : cultural policies, Yuan dynasty, recent Japanese research

^{*} Adjunct Lecturer,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yushu Sangyo University, Japan.

^{**} Lecture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ukuoka University, Japan.

